

图一 分水岭东周墓地墓葬分布平面图

注：该图为发掘报告原图，为说明问题，这里将原图中凡积石积炭或规模较大的“对子墓”做了涂黑，并标明M273位置。

《墓地》称第一组时代属春秋中期，第二组以后分属战国早期和中期，并说“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时间跨度大，有明显的缺环”，即缺乏春秋晚期的铜器墓资料^③。

我们再把注意力回到墓地总平面图上：《墓地》发表的总平面图中 III 区最东边有一个 M273，但却没有发表该墓相关资料。然而在长治市博物馆陈列馆展厅和以往未发表资料里，确有分水岭 M271、M272、M273 三座墓号相连的墓葬所出铜器资料，其中所见 M271 有列鼎 1（失盖）M272 有列鼎 3、M273 有盖鼎 1 和敦 1。这些铜器都非常完好，估计还应该属于这 3 座墓的未修复铜器存于博物馆库房，也就是说，其中 M272 用鼎数目应该不止 3 鼎。而且这 3 座墓的铜器时代相同，墓号相连，因此，很可能在 III 区和 V 区之间还应该有一组包括 M271、M272、M273 在内的中型以上墓葬组（是否为“对子墓”已无从知晓）。从平面图看，M273 尺寸不大，抑或是一个陪葬墓？M271、M272 应在其左近。如是，则该墓地应该存在不少于 7 组的同一等级的墓。下面我们姑且将其合为一组，并由西向东逐组分析。

二 大型“对子墓”分析

分水岭墓地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墓地》称：出土铜器总共 1985 件，其中青铜容器共 300 余件、乐器 63 件，“但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分水岭出土材料散失多地，能确定地点的就有 14 处，……发掘资料多有阙如，原始底图凌乱，出土器物也没有很好

的保存，而如今破碎以及易损的文物已经面目全非，多数根本没有修复的可能，在长治博物馆整理部分器物时，由于有些发掘编号被馆藏文物号覆盖，因此没有整理它们，整理时按缺失对待”^[4]。出于上述原因，《墓地》所发铜器资料就非常有限，如铜容器，发表资料不足出土总数四分之一，因此上述 M271 - M273 铜器资料缺失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墓地》公布的墓地总平面图是“通过整理，选出要发表的墓葬再重新绘制……剩余墓葬的位置没有在平面图上体现”^[5]。鉴于此，本文只能依据《墓地》现有资料，并参考早年发掘简报，再适当补充个别馆藏资料进行粗略的研讨（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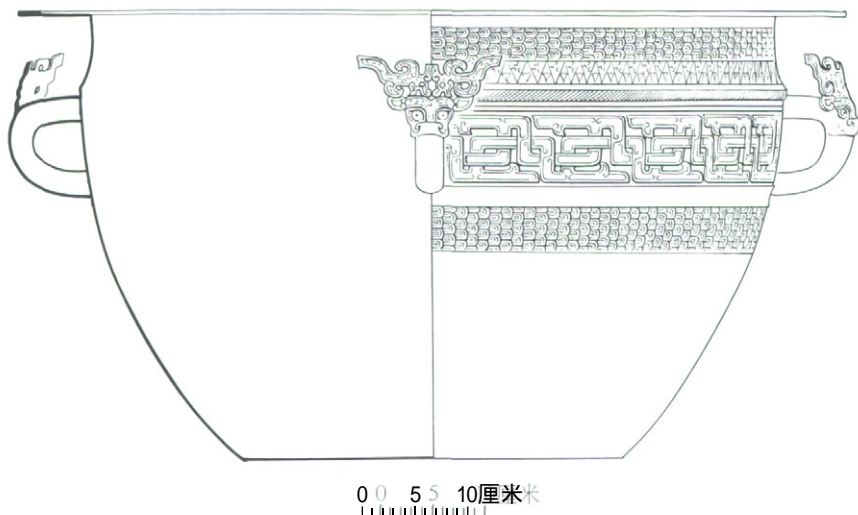
表一 分水岭大型“对子墓”情况简表（由西向东为序）

墓号	269/270	271/272/273	126/127	26/14	25/12	35/36	20/21
墓葬形制	竖穴土圻，均无积石积炭	不详	均为积石积炭	均为积石积炭	均为积石积炭	M35 积石积炭，M36 无积石积炭	M20 积石积炭，M21 不详
墓向	M269 北偏东 22 度，M270 北偏东 20 度	《墓地》平面图显示 M273 为东西向	M 1 2 6 北偏东 18 度，M 1 2 7 北偏东 22 度	M26 北偏东 17 度，M14 北偏东 20 度	M25 北偏东 20 度，M12 北偏东 20 度	M35 北偏东 20 度，M36 北偏东 22 度	M20 北偏东 20 度，M21 北偏东 20 度
墓口尺寸	5.6×4.6(M269) 5.7×4.4(M270)	不详	8.4×6.7(M126) 8.1×7(M127)	7.65×6.1(M26) 8.08×5.76(M14)	6.7×5.6(M25) 8.9×8.06(M12)	7×6.6(M35) 5.8×5.0(M36)	8.4×7.3(M20) 6.3×5.2(M21)
墓主性别及墓葬位置	M269 男，居东 M270 女，居西	不详	M126 男，居东 M127 女，居西	M14 男，居东 M26 女，居西	M12 男，居东 M25 女，居西	M35 男，居西 M36 女，居东	M21 男，居西 M20 女，居西
用鼎数目（依据以往简报和新出版《墓地》）	M269 为 9 鼎，5 件列鼎；M270 为 10 鼎，2 套 5 件列鼎	仅见 M271 鼎 1，M272 鼎 3，M273 鼎 1，余不详	M126 不详，仅提及 1 件鼎和鼎耳 8，当为 5 鼎；M127 有残鼎足 1	M26 为 7 鼎，5 件列鼎，M14《墓地》仅录 1 鼎，原简报称为 9 鼎，其中 7 件一套列鼎	M25 为 5 件一套的列鼎，M12 为 5 件一套的列鼎	简报称两墓均被盗，《墓地》录 M35 铜鼎 1、陶鼎 6，M36 铜鼎 2	M20 被盗，余铜鼎 1，M21 为陶鼎 5
乐器	M269 钮钟 9、甬钟 9、石磬 10，M270 钮钟 8、甬钟 9、石磬 11	不详	M126、M127 均有编钟，数目不详；M126 有石磬 18 ？	M14 钮钟 8、甬钟 1，石磬 11	M25 钮钟 9、甬钟 1、铸钟 3、石磬 10	不详	不详
车马坑	270 西南有 2 座马坑，分别殉马 2 匹	不详		M14 有车马坑，出 17 辆车、5 只犬 34 匹马			
时代（依据《墓地》）	第一期（春秋中期）	《墓地》缺	第二期（战国早期）	第二期（战国早期）	第二期（战国早期）	第四期（战国中期）	第四期（战国中期）
时代（依据本文）	春秋中期晚段	春秋中晚期之际	春秋晚期	春秋战国之际	战国早期	战国中期	战国中晚期之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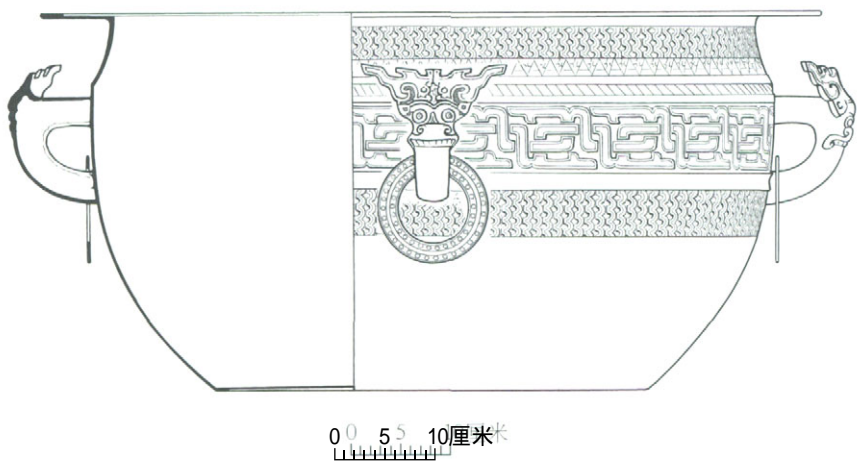
注：《墓地》分五期是依照陶器墓，铜器墓没有第三期和第五期。

1. 第一组（M269/M270）

这是已知诸组中唯一没有积石积炭的 5 鼎大墓（这个时期的积石积炭仅见于诸侯以



图二



图三

图二
分水岭M269出土铜鉴
(M269:33)

图三
万荣庙前出土铜鉴
(58M1:20)

上大墓)。其西南三米处还有马坑 2 个(《墓地》平面图未标出),内各殉马 2 匹^[6];东西两边还有中小型铜器墓,其中东边的 M53 有 5 件列鼎(该墓似乎不是“对子墓”,且规模较小)。M269/M270 是已知 6 组“对子墓”中尺寸最小的一组,其中 M269 出土铜鉴(图二)与临猗程村 M1002^[7]、万荣庙前 M1^[8]、辉县琉璃阁 M55^[9] 等墓葬所出铜鉴形制纹饰均极相似(图三),这种形制的鉴为春秋中期晋国特有器种之一。曾有人认为该组墓葬属赤狄^[10],但史载赤狄于公元前 593 年即被晋国所灭,而该组墓葬时代绝不会早过这个时段。再从墓葬整体情况看,它无疑属于典型的晋文化,其年代下限不会晚于公元前 550 年。

2. 第二组 (M271 - M273)

本组资料《墓地》未予发表,情况不详,但出土铜器在长治市博物馆展出并标有出土地点和墓号,山西省文物局曾于 2002 年对所有馆藏文物做过一次大规模普查,并做了文物信息档案,该组铜器照片即当时所摄(图四至图九)。其中 M272 有 3 件列鼎均较完好,从器形和纹饰看,应属春秋中晚期之际。M273 出土扁圆带盖铜敦更具断代意义,这种器形仅见于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早段,故该组墓葬时代不晚于公元前 520 年。无论墓葬位置还是出土铜器,该组墓葬正可弥补分水岭铜器墓的时代缺环。



图四



图五

图四
分水岭M271出土铜鼎

图五
分水岭M272出土铜鼎（三
件列鼎之一）



图六



图七

图六
分水岭M273出土铜鼎

图七
分水岭M273出土铜鼎盖顶



图八



图八
分水岭M273出土铜敦

图九
分水岭M273出土铜敦盖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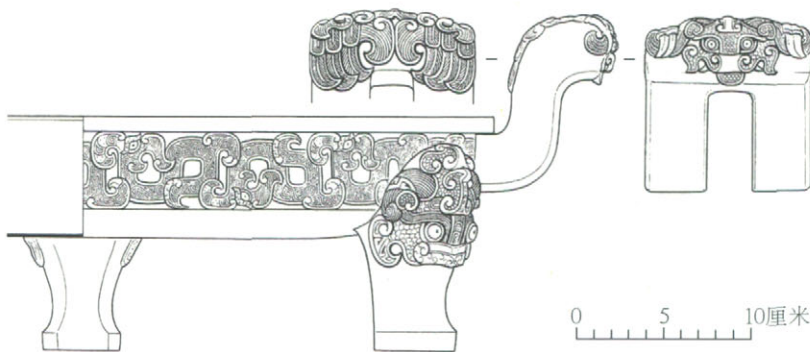
图九

3. 第三组 (M126/M127)

积石积炭墓, M126 出土器物多达 700 余件。所出铜鼎因残甚, 迄今没有其图像资料。当年简报仅将一种高浮雕饕餮纹器耳和“螭首”当做鼎耳和鼎的附件^[1], 但饕餮纹器耳应该用于盘而非鼎, 如春秋晚期的太原金胜村 M251 和芮城坛道出土盘耳^[2]即这种类型(图一〇、一一)。至于所谓“螭首”, 其实是晋式铜器常见的壶耳(图一二、一三), 如记述公元前 482 年“黄池之会”的“赵孟齐壶”就是这类壶耳(图一四)。M126 出土的错金盖豆常被作为战国铜器的典范(图一五), 其实这种器物在春秋晚期就很流行, 如太原金胜村 M251 出土错红铜盖豆就是这种类型(图一六)。金胜村 M251 出土盖豆上刻有“先”字, 同墓还出有“先城戈”^[3], 均应系公元前 497 年至公元前 490 年期间赵简子在讨伐范氏、中行氏和先氏战争中的战利品。先氏本是晋国望族, 文献多见记载, 但此战以后先氏不见史迹, 所以金胜村 M251 所出刻有“先”字的盖豆年代应该不晚于公元前 490 年, 分水岭盖豆时代自然也应该与之相当。M127 出土资料发表更少, 《墓地》仅见车马杂器, 但在以往未发表的发掘资料中确有一件 M127 所出铜鼎资料(图一七、一八)^[4], 纵观该组墓葬时代, 定为公元前 480 年左右的春秋晚期似更恰当。积石积炭大约也正是这一时期开始流行于诸侯级别以下的大中型墓葬。



图一〇



图一一



图一二



图一三



图一四

图一〇
分水岭M126出土器耳

图一一
太原金胜村M251出土
铜盘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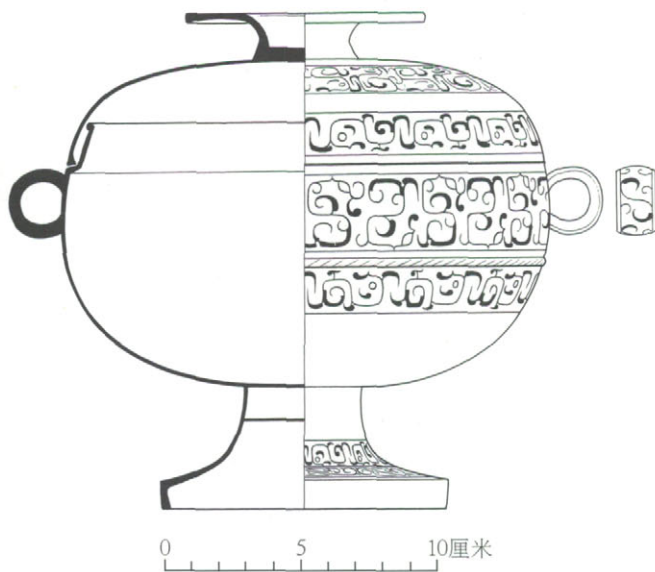
图一二
分水岭M126出土铜
“螭首”

图一三
传世晋国圆壶壶耳

图一四
赵孟齐壶壶耳



图一五



图一六



图一七

图一五
分水岭M126出土错金盖豆

图一六
太原金胜村M251出土错
红铜盖豆

图一七
分水岭M127出土铜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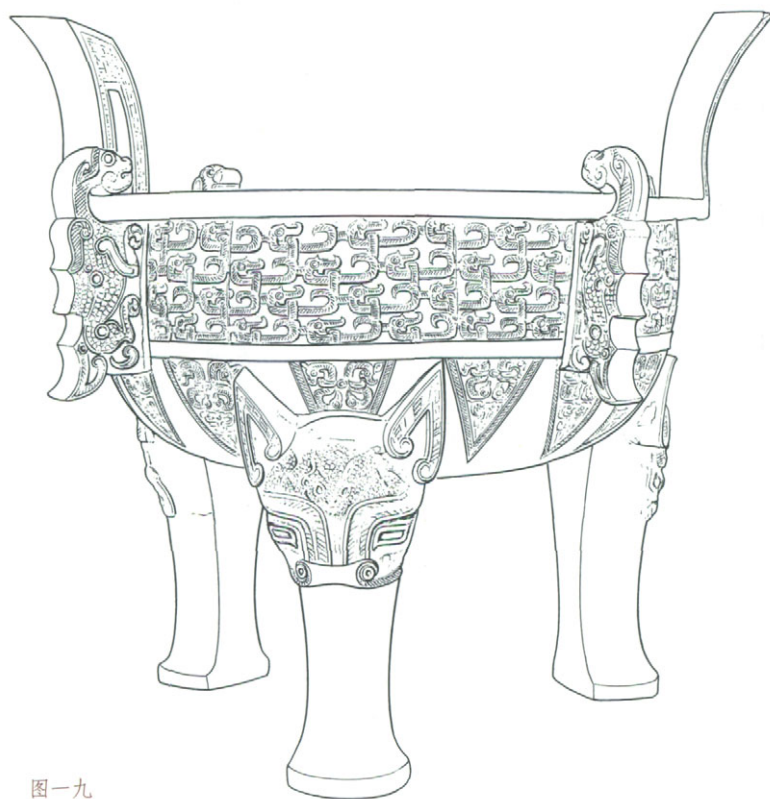
图一八

4. 第四组 (M26/M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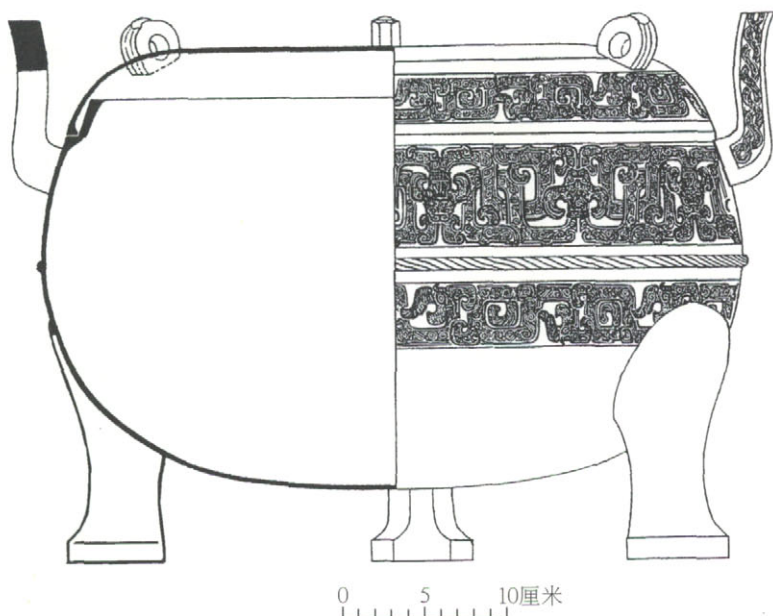
积石积炭墓。M26 出土 7 鼎，除 5 件有盖球形素面列鼎外，还有 2 鼎很古朴(图一九)，属于当时的百年古董。M14 出土了一套 7 件列鼎，是分水岭墓地出土列鼎最多的墓葬。鼎器形扁圆，盖鼎有 3 个桥型纽，蹄形足短而粗，是典型春秋战国之际样式(图二)。另外该组是唯一具有车马坑的组墓，车马坑呈曲尺形，内陪葬车 17 辆、犬 5 只、马 34 匹。M14 墓主系男性，墓内出土成组编钟编磬之外，还有一件疑似琴轸钮的器物(图二一)。此外该墓近旁的 M104 和 M7 也分别出有琴轸钮(图二二、二三)。这 2 座墓

图一八
分水岭 M127 出土铜鼎局部

图一九
分水岭 M26 出土铜鼎
(M2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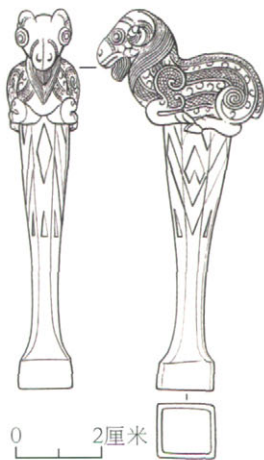
图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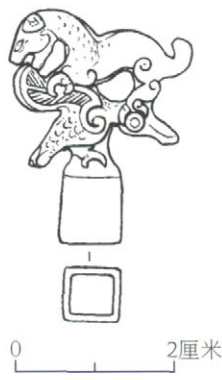
图二〇



图二一



图二二



图二三

图二〇
分水岭M14出土铜鼎
(M14:24)

图二一
分水岭M14出土琴轸钥
(M14: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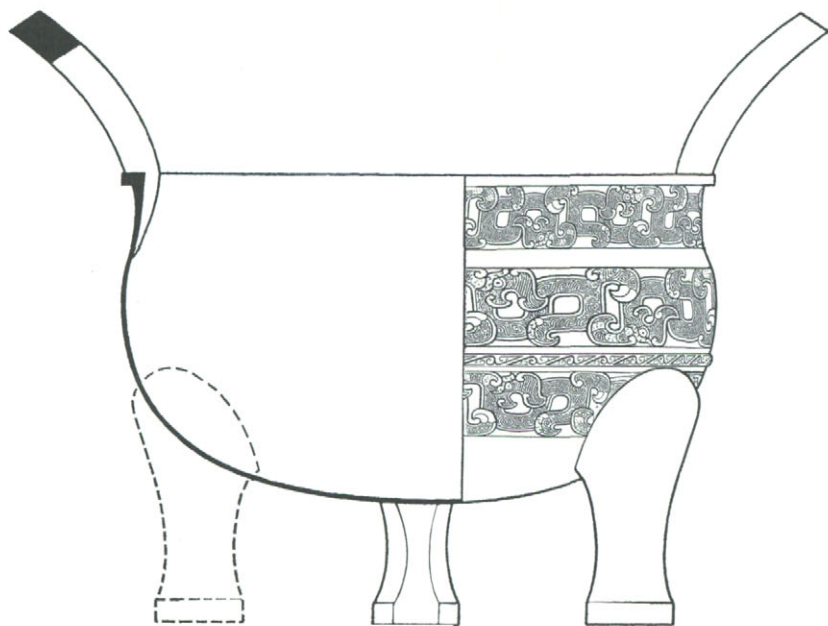
图二二
分水岭M7出土琴轸钥

图二三
分水岭M104出土琴轸钥
(M1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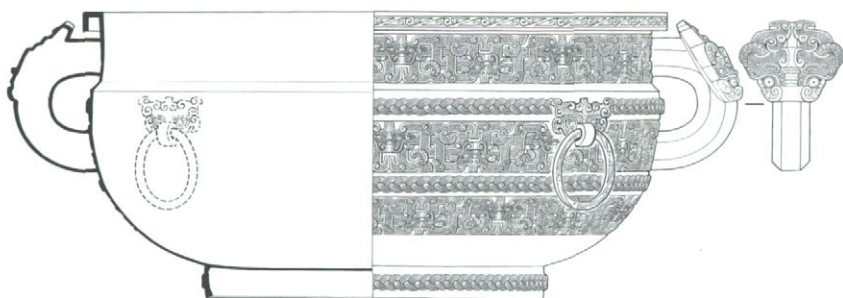
应该是 M14 的陪葬墓，死者应为仆从或女乐。主仆墓内同出琴轸钥^[15]，加之该墓豪华的礼乐器、排场的车马坑，反映了墓主生前声色犬马的一个侧面。墓葬时代约为公元前 450 年左右。

5. 第五组 (M25/M12)

积石积炭墓。M25 所出立耳鼎属于战国初年式样(图二四)，出土铜鉴的纹饰与河南辉县所出“智君子鉴”完全相同(图二五)。“智君子”被认为是晋国智伯，公元前 453 年在晋国内战中被韩、赵、魏联手剪灭，所以 M25 出土铜鉴也不会晚于公元前 5 世纪中叶。M12 出有刻纹匝、球形敦、方壶、错金舟、蟠螭纹鉴等，尽显战国早期特色，其年代大约与山彪镇 M1 相当。山彪镇 M1 出有一件“周王段戈”，应该是周王赏赐山彪镇 M1 墓主的物品。“周王段”即周敬王(前 519 - 前 476 年在位)，周敬王名“丐”，字“段”。“周王段戈”赏赐给山彪镇 M1 墓主时代应不晚于敬王逝世的公元前 476 年，所以受赐者入



图二四



图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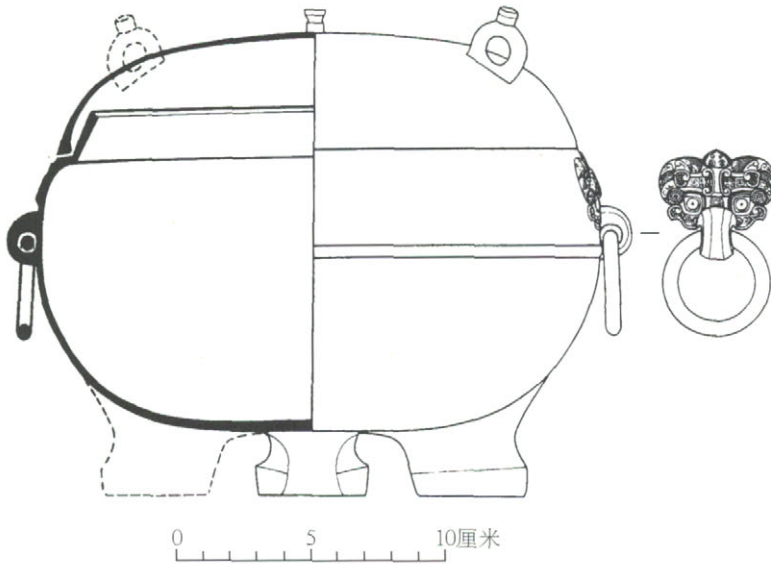
图二四
分水岭M25出土铜鼎
(M25:32)

图二五
分水岭M25出土铜鉴
(M25:38)及纹饰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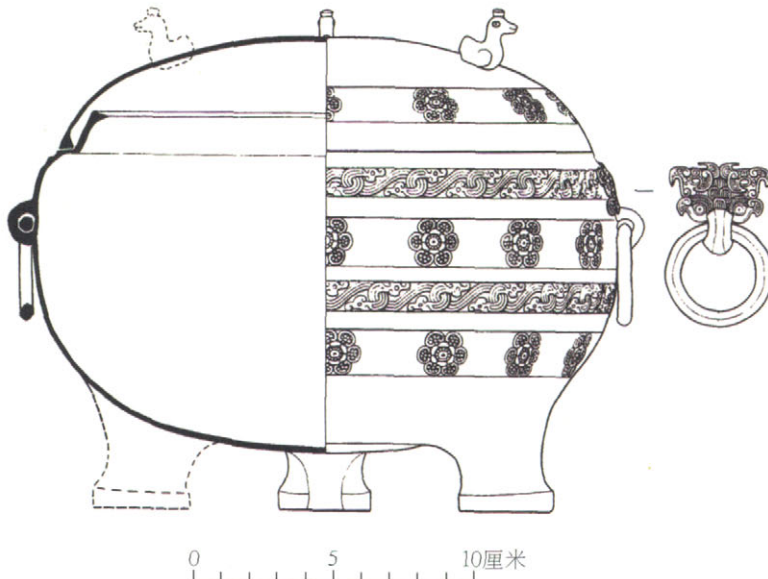
葬年代也不会晚于这个年代太久^[16]。综合分析，分水岭 M25/M12 年代大致，相当于公元前 430 年左右，其中 M25 早于 M12。

6. 第六组 (M35/M36)

M35 积石积炭，也是已知分水岭墓地唯一有墓道的墓葬。但该组墓曾经被盗，出土铜器并不多，M35 仅存 1 件鬲鼎，与太原金胜村 M251 所出鬲鼎形制相同，只是没有纹饰(图二六)。另还有成组仿铜陶礼器。M36 无积石积炭，所出鬲鼎饰六瓣花朵纹(图二七)，这种花朵纹和该墓出土圆壶所饰双头凤鸟纹均见于侯马铸铜遗址晚期陶范上^[17]；而该墓出土圆壶器形，与传世“令狐君嗣子壶”形制非常相同，“令狐



图二六



图二七

图二六
分水岭M35出土铜鬲
(M35:4)

图二七
分水岭M36出土铜鬲鼎
(M36: 2)

君嗣子壶”共两件，学者考证铸于公元前416或前392年^[18]。推测该组墓葬时代约当公元前380-350年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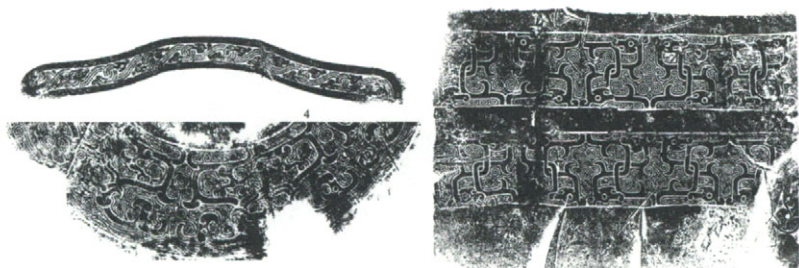
7. 第七组 (M20/M21)

M20 被盗，尚余铜鼎1，鼎上纹饰(图二八)与侯马铸铜遗址晚期陶范纹饰(图二九)基本相同^[19]。M21 随葬陶鼎7，其中5件彩绘鼎。整体观察，该组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稍晚，即不晚于公元前3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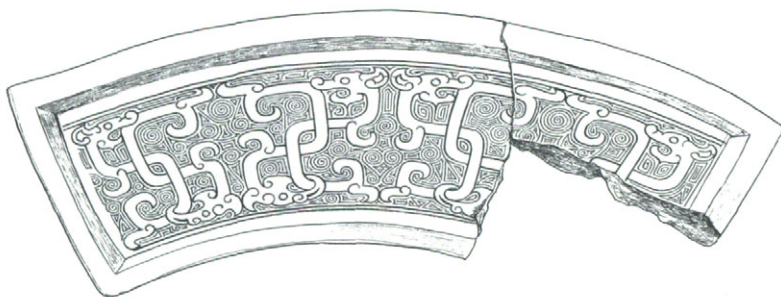
三 问题讨论

上面简要分析了分水岭7组铜器墓，有以下几点看法：

1. 《墓地》将分水岭墓葬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晋国墓葬……，第二、三期为赵



图二八



图二九

图二八
分水岭M20出土铜鼎
(M20:1)纹饰

图二九
侯马出土陶范纹饰

国墓葬，第四、五期为韩国墓葬……，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时间跨度大，有明显的缺环，没有明显的延续关系”^[20]。我们认为：这一认识正是由于《墓地》自己所说“资料多有阙如”造成的^[21]。完整的水岭墓地资料表明：该墓地始于春秋中期晚段，终于战国中晚期之际，前后沿用200多年，期间并没有间断，其中排列有序的大墓墓主可能就是同一家族。整个墓地出土青铜礼乐器以及兵器、车马杂器，其造型和纹饰几乎均见于侯马铸铜遗址各段陶范。侯马铸铜遗址使用时间大致起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的春秋中期，终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战国早中期之际。春秋中晚期之际，晋国青铜文化在风格上发生过一次突变，黄铭崇先生说晋国青铜文化以春秋中期为界，之前属于“前新田风格”，之后属于“新田风格”^[22]。分水岭前两组墓葬(M269/M270和M271/M272)铜器正是前者的样板，从第三组墓葬(M126/M127)以后的各组铜器就属于典型的“新田风格”铜器，也就是人们习称的“晋式青铜器”。所以说，分水岭青铜器只是同一文化的前后阶段的风格差异，而非“缺环”或文化类型不同。

2. 《墓地》认为分水岭墓地考古学文化“战国以前为晋文化地方类型，战国以降为典型的赵文化，后来尽管有韩人活动，但就其文化面貌来说，并不会发生变化”；又说“分水岭墓地164座东周墓葬中被打破的有22座，但全部被秦以后墓打破，东周墓葬间无打破关系”^[23]。事实上，从墓葬平面图看：分水岭大墓以西早东晚大致呈一线有序排列，每组间隔约30-50年左右，四周分布着显然是经过规划的疏密不等的中小墓群。按《周礼·春官》：“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数，使皆有其私地域。”结合该墓地沿用200余年，即便早晚期墓葬互有交错也无打破关系这一点看，该墓地显然是一个整体，使用期间应有专人管理，是一片包含诸多家族墓的“邦墓”区。而整个墓地的青铜文化面貌与侯马上马、万荣庙前、临猗程村、太原金胜村、长子牛家坡、潞城潞河、辉县琉璃阁、陕县后川、邯郸百家村、汲县山彪镇等晋国青铜文化面目毫无二致。更可贵的是分水岭墓地时间跨度相对更长，

资料更完整^[24]，其中突出的特色是广泛使用错金工艺和篆刻工艺，如错金盖豆、错金舟、错金带钩、错金剑、错金镞，以及刻纹匝、刻纹盘、刻纹鉴等^[25]，具有强烈的晋文化时代风格。

3. 墓向也是确认墓葬族属的重要依据之一。《墓地》称分水岭墓葬依时间早晚分属晋、赵和韩。又称墓地 81% 的墓葬均为南北向^[26]。察两周贵族墓葬方向：凡姬姓，无论周原、丰镐、洛邑的周王族，还是各姬姓诸侯如郑公、卫公、晋侯、燕侯、魏王、韩王等其墓向无有例外均为南北；而一些非姬姓贵族，如嬴姓的太原晋国赵卿墓、邯郸赵王陵、邯郸百家村赵氏墓地、河南林州大菜园赵国墓地，以及同为嬴姓的秦王陵，还有南方的半姓楚人墓，则无有例外都是东西向^[27]。典型的例子还有河南辉县琉璃阁墓地：其早晚期墓葬分别为东西向和南北向，这恰是因为早期墓葬（如甲乙墓、M80、M55、M60、M1、M75 等）属晋国祁姓的范氏，晚期则属三晋姬姓的魏氏^[28]。再看长治分水岭：81% 的墓葬为南北向，若说它们是赵人墓，其可能性应该为零。《墓地》又称上党腹地战国时先属赵，后归韩。其实三家分晋时赵、韩共同瓜分了上党盆地，两国都设有上党郡，赵上党郡曾辖 24 县，韩上党郡辖 17 县，两国疆域犬牙交错、常有变化^[29]。紧邻长治的长子县牛家坡春秋战国墓地，墓葬多为东西向，其中牛家坡 M7 为 5 鼎大墓，墓向东西，墓内有殉人 3 个，殉人位于墓主两侧和足下^[30]。这种墓向和墓内殉人的葬俗，同样见于太原金胜村 M251、河南林州大菜园和河北邯郸百家村赵氏墓地^[31]，应该是赵氏特有的葬俗。而分水岭墓地大墓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小墓葬为南北向，所有墓内均无殉人，这种葬俗则与郑韩故城的韩氏墓葬高度一致^[32]。由此可见：长治和长子东周墓地虽相距较近，青铜文化面貌也相同，但两地葬俗却明显不同，应该分属韩、赵二氏。

4. 周代是宗法等级制社会，人死后不仅聚族而葬，而且会按照宗法等级关系排列墓葬位置。因此，分水岭墓地绝大部分呈南北向的中小墓葬当为姬姓的韩氏族入墓，大墓墓主则当为韩氏某支世袭“大宗”的贵族。韩氏出自晋国宗室，是晋国强宗大族，枝繁叶茂，春秋战国一代绵延不绝。史载韩上党郡战国时为韩国别都，至公元前 262 年才易手归赵，著名的长平之战就是因韩国上党郡郡守冯亭率郡归赵而引发，长平之战后该地才被秦人染指。总之，无论根据文献还是考古资料，分水岭墓地属韩都顺理成章。也就是说，分水岭墓地在三家分晋前属晋国韩氏，三家分晋后则属三晋韩国，就其文化面貌而言，虽然晋国后来一分为三，但整个三晋地区的青铜文化仍然是一个难以区分的整体^[33]。

5. 至于分水岭大墓墓主的身份，春秋时应该是受封于此的晋国韩氏贵族，并可能兼有本地地方长官和采邑领主双重身份。战国时则情况比较复杂，因为战国时期确立的郡县制使得原来的采邑领主未必就是当地地方长官；另外，战国时期的士大夫可以自由奔走于列国之间出将入相，如吴起、苏秦、张仪、范雎等故事。再则，周代已经有官僚退休制度，即“致仕”、“致事”或“告老还乡”，《春秋公羊传》注“退而致仕”即“还禄位于君”，意指官员到特定年龄须交还权力给君王。文献记载晋国“祁奚举贤”的故事^[34]，也可窥见当时官僚退休制度之一斑。所以，战国时期的分水岭大墓墓主无论是官僚显贵还是地主富商，分水岭毕竟是其家族茔地所在，他不管生前身在何处，死后归葬祖茔都理所当然。反过来说，战国时上党地区的地方长官也未必非韩氏莫属，史载韩国上党郡郡守名叫冯亭即是明证。时人也许今天是寒士，明日就可能拜将相，但其官职与贵族身份却不能等同，因此，若认定大墓墓主为上党郡郡守自然也不靠谱。总之，从墓地排列分布、墓葬规格演变等因素分析，大墓墓主应该是大夫级世袭贵族，其墓葬经历的由竖穴土圹到积石积炭、由五鼎

到七鼎^[35]、由铜鼎到最后出现陶鼎,可以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墓葬演变的一个缩影,其中不同组别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多寡变化也折射出这个家族的兴衰和社会变迁。

分水岭墓地发掘是上世纪 50-70 年代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当时的发掘工作就不够系统和规范,加之后来出土文物和图文资料的散失和损毁,所以给研究工作造成巨大困难。以往学界对分水岭墓地属韩已几无异议,本文只是在补充部分资料的基础上重申这种观点而已。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当年分水岭墓地资料整理工作负责人张德光先生的多方指教,他还为本文提供了部分宝贵资料^[36],在此深表谢忱。

注释:

- [1] 分水岭早期发掘简报有: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年第3期。边陈修:《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4期。边成修等:《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 [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70页。
- [3][20] 同[2],第376页。
- [4][21] 同[2]第4页。另据当年分水岭墓地资料整理工作负责人张德光先生告知:上世纪60-70年代为“备战”,分水岭出土的一部分青铜器曾被“疏散”至许多地市文物部门或博物馆,后历经时事和人员变故,现已无法知其下落。同在“文革”期间,存放在山西省博物馆库房的分水岭部分发掘图文资料曾被雨水浸泡而毁损殆尽。因此尽管山西博物院和长治市博物馆现存有大量分水岭出土文物,但却难以进行整理。
- [5] 同[2],第8页。
- [6] 边成修等:《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临猗程村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图96。
- [8] 杨富斗等:《万荣庙前东周墓葬发掘收获》,《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1页图四:2。
- [9]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图版柒拾。
- [10] 侯毅、田建文《两周时期春秋墓葬》,载《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杨林中:《从分水岭M12、M25看晋东南地区的积石积炭墓》,载《鹿鸣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 [11] 边陈修《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4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博物院、长治市博物馆:《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
-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74页图三四;邓林秀:《山西芮城东周墓》,图一三:5,《文物》1987年第12期,第42页。
- [1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0页图一八、第98页图四八。
- [14] 山西省文物局曾于2002年对所有馆藏文物做过一次大规模摸底,并做了文物信息档案,分水岭M127铜鼎照片资料即当时所摄,同时记有该鼎尺寸:通高31.3、口径32.7厘米。
- [15] M14出土物原简报称“鸱鸢饰”,《墓地》称“铜鸟饰”。所发表照片下半部状况不明,本文依据最原始的照片推测疑是琴轸钥。据称该器物已于上世纪中叶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M7位于M14与车马坑之间,推测应属M14的陪葬墓,1957年第1期《考古学报》曾发表过M7的出土资料,该墓出有铜剑和铜镞,琴轸钥当时被称作“铜羊”,墓主应为男性(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M7出土琴轸钥现陈列于山西博物院展厅,1999年出版的《山西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华》第44页曾刊印有这件琴轸钥照片。新出版《墓地》对M7资料未予发表,仅在墓地平面图标出其位置。

- [16] 陈昭容《论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及国别》，《中原文物》2008年第3期。
- [17] 花朵纹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二〇七4、5。
- [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图版九六：4。令狐君嗣子壶，1928至1931年间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出两件，学者考证铸于公元前416或前392年，器主为三晋魏氏后裔。分水岭M36出土圆壶与之形制相同，只是缺失壶盖。
- [19] 李夏廷《晋国青铜艺术图鉴》，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图302.3。
- [22] 黄铭崇《山彪镇1号墓的历史座标》，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古今论衡》第5期，2000年。
- [23] 同[2]，第6页。
- [24] 分水岭墓地跨越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晚期，期间几乎没有间断，当晋文化腹心地区晋南盆地于战国中期被秦屡屡攻击后，晋文化也就难以延续。而上党盆地相对封闭，因此直至战国晚期才受到大规模战争波及，加之自古盗墓之风较少涉及该地区，所以长治地区的晋文化资料相对更完整。
- [25] 同[2]，见于报告的有：错金盖豆见于M126，错金舟见于M126和M12，错金带钩见于M25、M53、M82，错金镞见于M53，错金剑见于M53，刻纹匝则见于M12、M79、M84，刻纹鉴见于M84等。可见错金和篆刻工艺始于晋、兴于晋的说法不谬。
- [26] 同[2]，第352页。
- [27] 相关资料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刘剑昆：《林州发现春秋战国墓群》，《大河报》2002年7月21日；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百家村战国墓》，《考古》1962年第12期；焦南峰、段清波：《陕西秦汉考古四十年纪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
- [28] 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科学出版社，1959年。琉璃阁墓地族属一直存在争议，大墓墓主有卫国说、晋国魏氏说和范氏说等观点。卫和魏均姬姓，可确认的卫和魏墓都是南北向，所以只有祁姓的范氏才最合理。从墓地时代看，琉璃阁墓葬可分早晚两期，早期属春秋中晚期，约当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晚期属战国中晚期，约当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以后，其间有数十年的间断。而晋国范氏占据该地正当春秋中晚期，即公元前六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58年范氏领地被韩、赵、魏、智四家瓜分，此后琉璃阁地区才成为魏氏土地。琉璃阁早期墓葬东西向，晚期墓葬南北向的现象正与这一历史事实相吻合。
- [29]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3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 [31] 三晋墓内殉人的习俗除见于赵国贵族墓外，也见于魏国贵族墓，如河南汲县山彪镇M1，不过姬姓魏国墓向均为南北向。
- [3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郑工作站：《新郑县辛店许岗东周墓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 [33] 三晋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葬俗或陶器上，其青铜文化差异甚微。这种情况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前如此，战国晚期以后情况不甚明了，原因大概是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战争动乱对文化的破坏异常惨烈，所以中原地区的战国晚期大中型墓葬很难保留下来，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多系传世品，青铜文化面貌颇显破碎和模糊。
- [34] 《左传·襄公三年》：“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嬖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说的是晋国大夫祁奚请告老还乡，晋侯要他推荐继承人，他推荐了其仇人解狐，后来解狐死了，晋公又向他请教谁可接任，他推举了自己的儿子祁午。这就是著名的“祁奚举贤，不避亲仇”的故事。
- [35] 由于简报和报告在统计和描述上存在出入，加之墓葬被盗等因素，分水岭各大墓确切用鼎数目不甚详实。本文只依据现有资料为准（参见本文“墓葬情况简表”）。通常所谓“用鼎”数目是以大小相次和形制基本相同的成套列鼎为准。据此，分水岭大墓墓主基本维持用5鼎，只有M14似乎越礼用了7鼎。
- [36] 张德光先生是山西省博物馆原副馆长，是当年分水岭墓地发掘资料整理工作负责人之一。张先生称：他后来将所有发掘资料都交付后继的报告整理小组，但报告在发表时对资料做了选择性取舍（参见《墓地》第4页说明及本文注4），本文所用部分资料即有张先生提供的但未被收入报告的资料。

（责任编辑 冯 峰）